中小学招男老师为啥这样难

部分地方中小学教师男女比例不均衡调查

成都市、贵阳市的一些小学，男女教师之比为1∶9；长春市全市中小学专任教师，男女比例约3∶7……尽管教师日益成为社会受尊重和被羡慕的职业，但部分地方基层城乡中小学教师性别比例失衡问题仍凸显。

新华社记者近期赴湘川黔吉等多地基层区县，就此问题的现状、症结与对策展开调查。

“女多男稀”情况仍然存在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近年来，针对当前中小学阶段教师男女比例不均衡的现状，各地纷纷出台政策，积极探索招收和培养更多男教师的措施。但相关问题在部分地方仍然存在。

据成都市教育局统计数据：2019年在该市专任教师中，普通小学男教师占比不足三成；初中男教师占比不足四成。成都市城区一所小学全校只有8名男教师，约占全校教师总数的10%。

在长春，截至2019年9月，该市专任教师中小学男教师仅占22.7%；初中男教师占28.6%；高中专任教师中男教师占32.6%。

据教育部今年6月发布的各级各类学校女教师、女教职工数，初中阶段教育和普通小学两分类中，女性专任教师人数都明显高于男教师。

贵州省贵阳市一所小学男女教师比例约为1∶9。该校校长告诉记者，男教师“荒”在一些不发达地区基层城乡中小学更突出。

不久前，湖南岳阳市平江县招聘教师，最后获聘的800余人中男性不足五分之一。在四川巴中市通江县、吉林白城市通榆县，近年新招教师中男老师占比均不足25%。农村的情况则更不乐观。

“男女老师在中小学教育中的角色就相当于家庭中的父亲母亲，缺一不可。”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善槐认为，少年儿童在成长期中过度缺乏与同性别教师互动，将对其性别意识、性格思维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与多名受访的一线教育工作者均认为，在对中小学生勇敢刚毅等个性品质、缜密的逻辑思维以及积极动手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上，男老师的作用难以替代，保持男女教师比例基本平衡对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男老师“荒”也给教育教学管理造成困难。平江县桂花学校校长黄远来告诉记者，因为缺男老师，学校组织一些需要人力物力的大型活动困难重重，经常会出现多所学校相互“拆借”男老师的情况。“学校办运动会，我们就要从其他学校‘借’教练、裁判，还要动员一些男家长来当志愿者，否则体力活很难办。”

另外，贵州、成都等地多所中小学校长告诉记者，由于绝大多数教师是女性，确实会在碰上生育高峰期时，出现季节性教师短缺问题，家长意见很大。

招男老师，挺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导致部分地方中小学男教师偏少的原因有多方面。

——来源少。“来应聘教师的报名者里，男性就比女性少得多。”黄远来说。记者发现，这样的失衡可以追溯到教育培养阶段。据四川师范大学统计数据，该校近三届本科师范毕业生中，女生占比超七成，2020届本科师范毕业生男女比例为22∶78；东北师范大学2018年至2020年毕业学生中，男生占比始终保持在24%左右。

——收入有限。在湖南，一位中小学男教师告诉记者，刚毕业的大学生应聘成为特岗教师后，月工资加上绩效工资、补贴等，一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一个人吃饱倒是没问题，但想要存钱买房安家真的困难。”

多地教育局负责人坦言，部分地方中小学青年男教师收入渠道有限，现实收入水平与社会普遍对男性承担家庭经济责任的期待不符。

——留不住人。采访中，贵州一名乡村学校校长将中小学老师称为“一眼望到头”的职业，在他看来，职称晋升慢、进步空间小等因素影响了男性进入中小学教师行业。四川省规定，省一级示范高中副高级岗位占比不高于40%，而小学副高级岗位占比却仅为不高于15%。

由于职业发展空间有限，导致部分地方基层中小学本就稀缺的男老师持续“外流”。“有的考公务员到乡镇或其他事业单位工作去了；有的辞职从事别的行业了；还有的被政府部门借调后，就不回来了……”贵州毕节一位乡村学校校长告诉记者，大部分男教师会想尽办法将学校作为过渡跳板，谋求更有“前途”的岗位。

多方施策纠失衡

记者了解到，当前在教师职业内部，男教师的“流动方向”是由小学初中向外跳槽，由公立学校向私立学校跳槽，由乡村向城市调动，这就导致在特定区域特定学段的男老师“荒”更加严重。

教育部曾表示，下一步将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改善教师队伍男女性别比例不均衡情况。一是完善教师待遇保障机制，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二是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加大对一线普通教师职称评审的倾斜力度，提高中小学中、高级岗位结构比例，指导各地在岗位结构比例内开展职称评审。三是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师范大学，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优秀男性报考师范院校。

四川师范大学校长汪明义等多位师范院校相关负责人均认为，应合理制定招生激励政策，优化教师招录政策与方式，从人才入口上改善教师性别比例失衡情况。

四川今年启动了中小学教师“安身工程”“安心工程”，通过加大教师周转宿舍建设、中小学教师住房建设，帮助中小学教师安心从教。

储朝晖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教育评价机制比较单一，他建议通过建立更个性化、更多元的教师评价机制来吸引人才，进一步提升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尊荣感。

（记者：袁汝婷、胡浩、吴晓颖、骆飞、李双溪）　新华社长沙9月14日电

新华调查

外卖小哥成通事故高发群体

『合理』的算法为何『失控』

新华视点

新华社广州9月14日（记者王攀、马晓澄、胡林果）近日，一些网络平台外卖小哥的职业困境，让外卖平台与算法系统颇受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外卖小哥成为交通事故高发群体，曾以精准、合理、优化为标签的算法，引发业内广泛讨论。

“爬起来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不能超时”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外卖产业重塑人们日常生活，也成为各地发展经济和解决就业的重要抓手。美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通过该平台获得收入的外卖骑手总数达到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23.3%；今年上半年，在美团平台上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295.2万人，同比再度大幅增长16.4%。

收入相对较高、薪酬支付稳定、工作时间灵活，是吸引众多劳动者投身外卖行业的原因。35岁的广州外卖小哥伍召云说，他曾在工厂、酒店、物业公司工作，2017年加入外卖队伍至今，“觉得这个职业是很有奔头的”。

在外卖骑手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外卖小哥成为交通事故高发群体。近年来，国内多地都发生过外卖小哥因闯红灯、违规并道导致人员死亡的恶性交通事故。

记者从深圳交警部门获悉，仅今年8月，深圳全市就查处快递、外卖送餐行业交通违法1.2万宗，占非机动车违法案例总数的10%以上。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医护人员说，8月的每周都会遇到与骑手相关的单子。

“赶时间”是核心原因。一位骑手说，2018年前后平台给他的每单送餐时间是40分钟，但后来被压缩到30分钟。“有时候从商家拿到外卖都过去20分钟了，剩下的10分钟我要骑行3公里、跑进小区、等电梯上楼。”他说。

平台压缩时间的主要依据是建立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基础上的算法系统。与算法系统相配合的还有一整套严格的考核机制：一方面，外卖平台以“按单计价”激励外卖骑手尽可能多接单送单；另一方面，平台通过准时率、差评率、配送原因取消单量等考核严格约束骑手。准时率的降低，意味着外卖骑手在平台的算法中失去了“接单优势”，也会在内部排名中降低名次，无缘各类奖励。

这种“算法加考核”的机制，令从业者心理压力倍增。一位骑手说，有一次他与电动车相撞，“当时爬起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能超时，都顾不上想对方和自己伤得怎么样，现在想起来觉得很荒唐。”

算法为何会“失控”？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算法困境”背后的深层问题值得关注。

一方面是平台“逐底竞争”，导致算法“失衡”。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第二季度，美团外卖、饿了么两家已包揽了外卖行业近95%的市场份额。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外卖行业高峰期短且集中的特点，决定了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在送餐速度上，导致原本应该综合多种指标的算法，忽略了骑手的安全和压力状况。

“外卖行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逐底竞争’，即不断试探送达时间的底线指标。把所有的竞争参数穷尽了后，压力就被推到骑手那里，导致骑手处于极限和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他说。

另一方面是复杂用工关系令风险转移，导致算法“失责”。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多数外卖骑手和外卖平台之间形成了复杂的雇佣关系。很多外卖骑手往往不跟平台直接签约，而是通过一些App跟第三方劳务公司签约，且劳务公司频繁更换。当出现事故的时候，容易导致多方相互踢皮球。

在一起外卖骑手撞伤行人案件中，骑手称2018年9月加入某外卖平台，刚开始App上的劳务协议显示雇主为宁波裕米公司；2019年8月App上的协议又变更为杭州邦芒公司，他搞不清楚雇主究竟是谁。在出事后的庭审过程中，宁波裕米与杭州邦芒均不承认黄某是自己的雇员。

负责审理该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波说，从合同上看，骑手和劳务公司之间是劳务关系，但实际上劳务公司与骑手的关系十分松散。平台用接单量、客户投诉情况考核骑手，充当了“雇主”的角色。而一旦交通事故发生，平台却躲在劳务公司背后，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在现行法律法规下，交警没办法处罚企业，只能处罚骑手。出了交通事故，是骑手个人而不是企业需要承担违规违法成本以及伤残死亡风险等。

仅有算法是不够的

面对社会质疑，饿了么称将尽快推出新功能——“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按钮，供消费者选择。美团则称将改进调度系统，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

有受访人士认为，解决外卖骑手面临的困境，最重要的是平台企业能够正视、尊重和真正保障劳动者权益，而不是让算法成为只会为企业赚钱的冰冷工具。

近年来，面对新兴业态的挑战，多地已开始加大管理力度。比如，广东佛山已建成89个固定交通安全教育点，加大对外卖快递骑手等群体的交通安全教育；对于员工交通违法较多、交通安全管理薄弱的外卖企业，佛山公安交警组织约谈企业负责人。

马亮建议，新兴业态必然会对现有的法律法规构成冲击和挑战，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职业安全、安全生产等的通用性法律，需要及时修订。跟某个行业直接相关的问题，也需要新的法规及时回应。

此外，外卖行业的问题牵涉多个部门，应进一步明确主要监管部门，对失序的竞争行为进行纠偏。马亮还建议，外卖骑手属于“流动中的安全生产问题”，也应该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压实地方政府监管和执法责任。

（参与采写：毛一竹、毛鑫）

选购儿童口罩，这些细节要“擦亮眼”

民生直通车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张辛欣、谢希瑶）随着各地学校陆续复课，儿童口罩的需求逐渐上升。市面上的儿童口罩五花八门，品类众多，价格也参差不齐。怎样选购安全有效、品质过硬的口罩，备受关注。

日前，我国发布了《儿童口罩技术规范》推荐性国家标准，对材料、佩戴、使用等指标作出专门规定。记者就此采访了参与标准制定的协会、专家、口罩生产商。选购儿童口罩，这些细节要“擦亮眼”！

◀北京朝阳区实验小学贵阳分校的学生，为前来讲课的抗疫医生点赞（五月二十五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续摄

不能选再生料　安全要放首位

佩戴口罩是为了有效防护，口罩本身不能成为“污染源”。什么样的口罩适合孩子？表面印花会否带来安全影响？怎样从外观、材料等进行直观判断？

材料直接接触儿童肌肤，其安全性是挑选口罩的重要考量。“《儿童口罩技术规范》提出了19项主要性能指标，包括安全、防护、舒适等方面，以安全为大前提。”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长李陵申说，标准规范了儿童防护口罩和儿童卫生口罩两类产品，在明确颗粒物过滤效率分别不低于95%、90%的同时，对生产企业原材料选用提出更高要求。

“相比较成人，儿童口罩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更注重减少心肺负担。”口罩滤材生产商泰达洁净公司有关负责人说，安全的口罩需要强大的“心脏”，即熔喷布要足够低阻、足够高效。

在无纺布选择上，标准明确口罩原材料不得使用再生料。“生产企业千万不要为低成本选择添加回料或碳酸钙填充物的无纺布材料，这些往往会有荧光剂。”儿童口罩生产企业蓝禾医疗董事长曹军提示说。

市面上，不少儿童口罩都印有各式各样的卡通图案，这些印花是否会对口罩效果带来影响？李陵申表示，标准建议口罩与皮肤直接接触材料不应印花或染色，消费者在购买时要特别留意。但口罩外观印花不会带来影响，协会也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个性化设计，提升儿童佩戴体验。

此外，专家提示选购口罩要对外观进行检查，不应存在可触及的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不应选购系带式口罩，配有呼吸阀的口罩呼吸阀应牢固不变形等。

“这些标准加大了对安全性能的强化，我们正在组织和推动更多口罩生产企业‘对标’生产，也希望消费者能够‘对标’选购。”李陵申说。

降低通气阻力　舒适与防护都重要

在对颗粒物过滤效率、细菌过滤效率等提出明确要求的同时，标准特别提出，儿童防护口罩要求呼气阻力和吸气阻力均不高于45Pa；儿童卫生口罩要求通气阻力不高于30Pa。在佩戴舒适性方面，推荐采用可调节式口罩带。

“对呼吸阻力的限制是基于儿童实际佩戴感受而来，并综合考虑了国内外儿童口罩和过滤材料呼吸阻力的实际数值、人体舒适度等要求。”李陵申说，儿童处在身体成长发育阶段，头面部尺寸和呼吸系统能力都小于成人，要格外注重口罩的通气性能。

他建议，消费者在选购时要特别留意其标注的呼吸阻力等参数，切勿仅关注防护性能而忽视使用感受，避免佩戴时出现憋闷感。

按“标”选购的同时，专家也给出了一些直观的判断依据。“比如，符合防护要求的儿童口罩一定是立体设计的，普通的卫生口罩则以平面居多。一般而言，在低风险地区佩戴卫生口罩即可。”参与标准制定的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专家赵瑾瑜建议，家长可依据场景在选择时进行参考。

“市面上销售的口罩包装上都会印有执行标准。标注‘GB/T38880—2020’的儿童口罩表明生产企业进行送检并通过第三方机构测评，可作为消费者选购依据。”赵瑾瑜说。

百余家企业过检　购买认准正规渠道

记者从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了解到，标准的制定经历了广泛采样、调研与测试。其中，参加标准起草的口罩生产企业有20多家，目前送检并通过测试的企业超过150家。

“目前市场上口罩生产企业很多，生产口罩的大多都涉及儿童口罩，品牌也比较杂，很难说谁占据很大市场份额。”赵瑾瑜告诉记者，我国口罩产业快速发展，品牌知晓度并不高。制造企业多是接单生产，除了一些企业建立了线上渠道，更多是通过分销商进行销售，销售网络较为复杂。

当前，大量儿童口罩已经通过依据标准进行的检测并投放市场。专家建议消费者尽量选择知名电商或正规实体超市、药店等进行购买。

“由于口罩品类较为特殊，一些已经达标的儿童口罩受限于‘非医用’品类，较难向药店等渠道铺货，建议相关部门和机构能够及时补充儿童口罩推荐指南，便于渠道商与生产商有序衔接。”赵瑾瑜说。

此外，根据标准，儿童口罩在包装上需要注明佩戴安全警示，比如儿童佩戴口罩期间不应打闹或进行中等和中等以上强度运动，如佩戴期间出现呼吸不适、皮肤过敏等症状应及时摘脱等。专家建议消费者在选购和佩戴时留意。

该对“保外就医”来一次全面“体检”了

安徽一男子伤人致死，获刑12年，却以“保外就医”名义并未蹲过一天监狱，并结婚生子。这也是继内蒙古一男子杀人获刑15年却一天监狱没进过，还逍遥自在当起了村干部，以及另一名因犯故意杀人罪本应在监狱服刑的男子王某凭借“保外就医”在狱外活动长达7年之后，又一起受到公众关注与质疑的反常案件。

让患有重疾的罪犯“保外就医”，原本是彰显人道主义的司法实践。但在执行中，却遭遇了变形、走样。在“纸面服刑”15年案件中，杀人者当年“保外就医”的关键证据“不翼而飞”，着实可疑；另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却在狱外活动长达7年，背后的真相已然浮出水面——法院公布的裁定书显示，5名狱医不同程度参与了对王某6次“保外就医”、1次暂予监外执行的病情鉴定造假，使未达到病情危重程度的服刑犯王某，仅“纸面服刑”。5人分别以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判有期徒刑3年至5年6个月不等。

“保外就医”，不能成为脱罪法宝。应当看到，近些年，由于缺乏有效监督，一些“保外就医”变成了“保而不医”，甚至演化成了滋生腐败的黑色交易。同时，有的“保外就医”，明显不符合相应的条件或是超过了必要的时限，一经启动便“一保到底”，使违法犯罪人员逃避应有的惩处。在一些反腐电视剧的经典桥段中，明显失当的“保外就医”也成为被针砭的对象。

“保外就医”，绝不能偏离法治轨道，不能为犯罪分子开辟“逍遥狱外”的特权通道。相关决定的作出与执行，必须有严格的制度流程，必须有充分的现实依据，必须有全链条的严密监管。否则，任由失当的“保外就医”横行，既是对受害者的明显不公平，也会直接侵蚀法治公信力。

当前，在部分“保外就医”事件屡屡引发质疑之际，有关部门绝不能视而不见、选择性失明。一方面，对于作出“保外就医”决定的过程，应当进行全面调查，详查每一个环节的相应依据，详查是否存在明显的弄虚造假以及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调查发现其中确实存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违法问题，也必须追责问责，依法予以从重处理，切实提高违法成本、形成震慑效应，进而遏制住试图钻制度“空子”的违法乱纪行为。

所有的“保外就医”，必须能够经得起法律的审视，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举一反三，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保外就医”相关决定的作出者不敢任性而为、肆意妄为，才是对法治原则的敬畏与恪守。是时候对“保外就医”来一次全面“体检”了！

（本报评论员梁建强）

每日一评